

斯特朗六次访华

心向中国



解放军出版社

心向中国

——斯特朗六次访华

[美]特雷西·斯特朗 著
海伦·凯瑟

王松涛 译

解放军出版社

心向中国

——斯特朗六次访华

[美]特雷西·斯特朗 海伦·凯瑟著

王松涛 译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5.75印张·124,000字
1986年3月第一版 1986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85·109 定价: 1.00元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出版说明

为满足党史、军史研究以及广大史学、文学爱好者的需要，我们决定出版《中国革命纪实译丛》。这套丛书收集的都是国外一些有名的政治家、作家、记者从不同侧面反映中国革命不同历史阶段斗争情况的著作，既有史料价值，又有一定的文学可读性。但由于作者本人的政治立场、思想认识和对中国情况了解不甚全面等原因，一些书籍中所反映的内容难免有误或带有片面性，有些观点可能与我们有着较大的差距。为了保持原书的面貌，我们基本按原文照印，请读者注意鉴别。

编者

译者的话

《心向中国——斯特朗六次访华》这本书，是美国著名进步作家、中国人民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年11月24日——1970年3月29日)生平传记的部分内容。她的传记(英文)于一九八三年在美国出版，作者是安娜·路易斯的侄孙特雷西·斯特朗及其妻子海伦·凯瑟。《心向中国》是译者为本书所取的书名。

《心向中国》这本书，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六次访华的历史纪实。本书前三章和“访华尾声”，摘译自传记第一章、第七章、第九章和第十五章。“故土重访”、“延安山城”、“延安精神”等记叙后三次访华的章节，是按原书第十章、第十一章和第十四章的全文译出的。

斯特朗六次访华的概貌和传记简介，见本书代序“再现革命观察家的一生”。

王松涛于斯特朗诞辰一百周年

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

目 录

再现革命观察家的一生(代序)	(1)
第一章 初访中国	(8)
第二章 再度访华	(19)
第三章 三访中华	(41)
第四章 故土重访	(54)
第五章 延安山城	(85)
第六章 延安精神	(110)
第七章 访华尾声	(152)

再现革命观察家的一生(代序)

柯如思(Ruth Evans Coe)^①

美国人特雷西·斯特朗与海伦·凯瑟近年来合写了《她的心灵深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作者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侄孙和他的妻子。夫妇俩把这位著名新闻工作者的不屈不挠、永不松懈的精神再现出来，写成了她的传记。作者为读者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位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生涯，经历了二十世纪的前七十个年头。两位作者都从未见过安娜·路易斯。(特雷西八岁时曾到海军队机场送行而遭拒绝。)

事实上，他们能够深入到这位阅历复杂、引人注目的妇女的心灵深处，从而向读者展现出她的思想、她的希望与需要、她的长处和弱点，同时也展现出她为掌握自己命运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的魄力。这一事实，证实了他们夫妇有能力成为传记作家，也再现了安娜·路易斯在她自己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作家本色。

一九八三年纽约兰德姆出版社发行的这本传记，把安娜·路易斯一生八十四年来在美国、苏联和中国的生活经

^① 柯如思即露丝·柯，一九七〇年她同邓颖超一起负责安葬斯特朗的骨灰盒。此文是她写给英文版《北京周报》的书评，由译者译成中文，代作本书的序言。——译者

历，很全面地倾诉给读者。这里我几乎只能限于评述她在中国生活的那些年代。

斯特朗六次访问中国。一九二五年，她年近四十时初次访华。那时，她不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新闻工作者，而且已经成为一位定期作旅行讲演的讲演家和作家了。她全心全意地追求她的目标：从革命发源地搜集革命信息，再把这种信息传播到世界各地。

她在学生时代就留下了光辉记录，二十二岁时就由芝加哥大学授予比较宗教学博士学位。青年时期，她是全美国和其他国家儿童福利事业展览会的卓越组织者、《西雅图工会纪事报》的特写作家、驻波兰和苏联的外国记者。

早在一九二一年，她就离开美国，到达新建立的社会主义苏联。她到那里，是为了亲自体验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九二六年一月她要返美讲演。在此之前，一九二五年秋，她感到自己在苏联未受信任和重视，就乘上横贯西伯利亚的快车来到中国，“以偿她多年来的冒险宿愿”。

一到北京，她就忙着拜会新交，联系旧交。有些组织请她讲苏联的发展状况。当时北京许多学生活动家是她的热情听众，他们如饥似渴地寻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验性知识。

她偶然遇到了来自莫斯科的老友范妮·鲍罗廷。范妮的丈夫当时是广州国民党政府顾问。范妮鼓动她去看看广州出现的新事物。“安娜·路易斯顺从了。范妮就通过宋庆龄，开始着手安排安娜·路易斯的旅程。”

初访中国时，斯特朗曾乘火车向北越过长城，经过寒冷的旅程，去访问“基督将军”冯玉祥。她对冯的印象倒不

是十分深刻，但她见到了冯的妻子李德全。三十三年以后，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欢迎斯特朗最后一次到中国来。

在广州时，安娜·路易斯怀着激动的心情去参加敢于斗争的妇女组织的会议和讲演活动。她同她的老朋友鲍罗廷夫妇、新朋友宋庆龄及廖仲恺先生一家探讨政治形势。后来，为了履行预约要到日本讲演，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广州。

初访中国，无疑有许多值得报道并能激动人心的新闻。这使象斯特朗这样无所畏惧的革命记者颇感满意。从中国和中国人民那里，她发现了极度感人的主题。她愿把她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集中到这个主题上来。但是，她还另有其他任务：她在美国有一年一度的旅行讲演，她在莫斯科办报，她还有作为一名外国记者的职业活动。斯特朗按照西方工作道德行事，从来不会食言爽约。只有当她没有任务时，才会感到心情不舒畅。

两年后，一九二七年，她又回到中国。她从美国乘船抵达上海。那是一个残酷无情而又关系重大的时刻，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街头屠杀共产党人。斯特朗未在上海久留。她去了汉口，她要亲眼看看“是什么力量使得汉口充满了革命激情”。

这次访问，导致她参加了鲍罗廷和一小群人的历史性旅行。他们经过河南、陕西、宁夏，来到蒙古的乌兰巴托，而后又换乘汽车和火车到达莫斯科。关于这两次访问中国的动人见闻，她写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

她的第三次访华，是在十年之后才实现的。那时，她已五十二岁了。她从意大利的威尼斯乘船到达香港，紧接

着到了汉口。在那里，她发现了“人世间痛苦的混乱局面……千百万从日本入侵区向西逃难的中国人，堵塞了街道、江岸和铁路沿线。城市的每寸土地都挤满了难民，他们在寻求食宿和失散的亲人”。

最后，她设法北上山西，去同朱德和八路军其他将领会晤交谈。

不过，三访中国中最重要的会见，还是在汉口访问周恩来和邓颖超。从邓那里，她了解到有关中国妇女现状的大量事实。

在这次访华期间，她第一次见到康克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一九三八年三月初，她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准备向美国人民作有关中国人民的专题讲演。这次中国之行，使她写成了她的《人类的五分之一》。

斯特朗第四次访华，来得有点偶然。那时，她正在竭力寻找一条航线，好从临战隔绝的苏联返回美国。她获悉，从阿拉木图到重庆有飞机。于是，她就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的后半月到了重庆。

她感到最幸运的是，此时周恩来正住在重庆，而且还捎信给她，说“他很愿同她会见，并愿意同她进行一系列的深夜交谈”。第一次交谈，周透露说，他想就蒋的将领们同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向她作出详尽的说明。周告诉她，这资料现在不能发表，要等她接到通知信后再发表。周不希望时机未到时加剧摩擦。周补充说：“不过，我们愿把这种资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国外人士手中，以便在蒋展开更加疯狂的进攻时及时揭露。我们担心这种进攻。”

斯特朗接受了这一任务，把这种信任和重托视为珍贵

的荣誉。一九四一年元月，她回到美国后不久，就接到来函，通知她照计划办。她发表文章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美国许多通讯社和报界人士，即使对这样重要的独家新闻也不肯接受，他们从来 not 发表有利于共产党人的任何报道。最后，她设法把资料交给了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的一位朋友。后来她才发觉，用另一个人的姓名署名的文章，正是“我曾经保存过的唯一的真正独家新闻”。

第五次访华也许是最著名的一次。一九四六年斯特朗来到延安时，已六十一岁了。来之前，她在美国曾一再遇到交通工具不便的困难。但是，她靠自己常有的坚韧以及对罕见信息的灵敏，弄到了美国海军航空运输服务队的正式签证，从旧金山飞往上海。她申请签证的理由是，她所期望的旅行“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七月底，她到达了延安。

斯特朗传记的作者谈到，斯特朗在延安的生活“是她忆想所及的最快乐的时光”。他俩引证斯特朗的话说，“在延安没有紧迫感，然而有着时代感，有着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这里感受到大地上一年四季的缓慢循环，这里感受到中国耕地扩展的极端困难。大地上空，太阳照常旋转，带来了播种与收获……因此，延安不论战事如何……（都是）……一个和平安全都有保障的地方”。

斯特朗在中国还有个“纸老虎女士”的绰号。因为，正是在毛泽东同斯特朗在延安的著名会见中，毛泽东首次作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在延安，她可以随便会见中国革命的所有领导人。她还兴致勃勃地住进了她那舒适的窑洞，而且打算在那里度过冬季，写出有关这些领导人的历史性故事。

不幸的是，在内战干扰下，不得不撤离延安。毛和周都认为，她最好不要坚持留在陕北的山岭之中，而应回国去向全世界讲述她在陕北亲身经历的事情。于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中旬她离开延安到了上海。她在那里呆了几个月，写完了她的《中国的黎明》。同时，她还设法使美国报刊登载了她发出的许多新闻报导稿件。一九四七年七月，她到了莫斯科。

离开延安后的十来年，也许是斯特朗一生中最艰辛的时期。一九四九年二月，她在莫斯科被捕，当时她正要启程来中国。她被苏联驱逐出境，返回美国。这就是她的“左派同志”所干出的勾当。此时到中国旅行也不可能，因为苏美两国政府都不给她签发护照。

直到一九五八年夏天，美国签发护照工作有所松动，她才有可能对北京之行作出计划安排。到那年十一月底，她就要满七十三岁了，而且健康情况也不佳。由于她的帕格特后遗症，她只得借助于拐杖行走。这就是她的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中国之行。她留在这里一直到一九七〇年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在斯特朗一生最后的十二年里，她在中国恢复了健康，继续以毫不懈怠的步伐工作。她搬进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大院的住宅中去，过着优雅高尚、幸福愉快的生活。她曾到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各地旅行，并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她既同国家领导人会见，也同街上的路人交谈。

不幸的是，在“文化革命”期间，由于朋友断绝来往，她最后的晚年显得忧戚伤感。她的信息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涸竭，她感到写作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不过，总的说来，她在中国还是安度了晚年的幸福岁

月。她甚至还宣称：生活在北京，强化陶冶了她的气质和情操。

能在半个多世纪内六次访问中国，并写出了有关中国的许多书籍和报刊文章，进行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专题讲演，仅这一个方面的活动，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就已是相当完美的一生了。而这些活动对于斯特朗来说，却仅仅是她生命的一小部分。她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活，一直工作到三十岁左右，然后几乎把二十五年以上的时光用于为苏联工作。同时，她也访问过墨西哥、英国、法国、德国、波兰、南斯拉夫、西班牙、老挝和越南等国家，并且从这些国家里发出了许多新闻报道。

特雷西·斯特朗和海伦·凯瑟在他们所写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传记中，搜集了大量的、丰实的资料。而他们的明确、生动的表达方式，更使很好的史实变成了很好的故事。

第一章 初访中国

蒙古男子是我在神话故事书外所曾见过的最迷人的生灵……使您欣慰的是，我不曾陪同这样的男子出走，不然我可能甘愿担起第二夫人的角色了。他们说，蒙古人当中常发生这种事。

——安娜·路易斯给父亲的信，一九二五年十月，
在横贯西伯利亚的快车上。

安娜·路易斯登上了开往海参崴的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的快车。阴冷无情的倾盆大雨，使她的心情更加沮丧；而她那头等私人卧厢，也只能惹起她的失望情绪。苏联一个首要的特许委员会拒绝批准她担任他们常驻纽约的代表。这年（一九二五年）一月，她开始在美国旅行演讲。十月八日她首途前往中国进行冒险旅行，以偿她多年来的宿愿。这以前，她一直没有承担过任何任务。她离开莫斯科时，既没有私人约束，也没有组织机构给她的束缚。她是很愿担负起不可推却的责任的。如果她能如愿以偿，也许她就不会乘上这列火车驶向东方了。

在这最辛酸的时刻，她抱怨她所有的一切自由就是“整个世界没一个人关心她”。她渴望有个寄托和依恋，那将使她安定下来，合乎情理地选择一个又一个去向。曾经诱惑过她的男子，现在都是她的好同志了。她对于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是必不可少的。她不能理解，为什么她跟那些能诱惑男人的女人那样的不同。她有些不安地意识到，再过

一个多月，她就满四十岁了。

这种失望情绪在眼前闪过去了。尚未开发的乌拉尔山坡，让位给阳光明媚的西伯利亚平原了。她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她已“换上了夏装……面前展现出一个伟大的生气勃勃的世界，使她高兴得心花怒放”。她夸横贯西伯利亚的快车比美国火车“更稳、更快、更便宜”，还谈到虽然她仍没有物色到一个能成为她生命核心的情人或丈夫，但到处都有她的朋友，他们都很乐意来看望她。是月，她到达中国后，面前又排满了关于苏联问题的讲演日程。这是她乐意承担的最繁重的任务。

在西伯利亚旅途上的交谈中，她结识了一位俄国妇女。这位妇女本人是蒙古人的一位“高高在上”的顾问，此行是要到蒙古会见她丈夫。当列车就要到达这位女友的目的地时，安娜·路易斯为她自己的旅程想出个新计划。在这个中途站上，她力图说服这位女友的丈夫帮助她穿越蒙古山岭到乌尔加(乌兰巴托)。从那里，她将继续那“一千五百俄里(一俄里=一点零六七公里)的汽车旅行，越过戈壁沙漠，从后门进入中国……”这段旅程本身就是一种冒险，而她还将有机会访问当时中国一位最重要的“军阀”冯玉祥将军。

他拒绝了她的请求，并警告说，没有蒙古的签证，他们可能被迫把她丢在远离附近任何一个火车站达四百俄里(二百六十五英里)的边境线上，他们自己驾车去乌尔加。她只得继续登上“平凡的路程”，同一些丹麦、瑞典的商人和各色各样的外交信使一起，从哈尔滨进入中国。一周半以后，她到了北京(当时的北平)。

一九二五年秋天，北京还是个旧中国城市。内城十七米厚的城墙完整无损，上边竖起方形堞齿，中间筑有枪孔。

护城河围绕着城墙，绿泥散发出臭味，河内长满了菌藻。安娜·路易斯的一位俄国女友维拉·维辛尼雅科娃·阿基莫娃住在北京，她描述了这里难以忍受的贫困和不卫生状况：“每条街的两旁，都有些乞丐。他们或站或坐或躺……肮脏不堪，半裸着身体。他们往往是瞎子或者眼红流脓，沙眼比比皆是。他们放声大叫，爬着或是跑着追赶行人，伸出一个用柳条编织的象小盘形状的篮子或是锡制的讨饭杯。”

值得注意的是，安娜·路易斯几乎不曾写过北京那些令人厌恶的地方。相反，她声称她已“爱上了”这个城市：“如果我在这儿干任何实际工作，我就甘愿在这里住下来。”她着重声明说，吸引着她的，既不是“异国的圣地文明和古代宫殿”，也不是“为了到外城旧货店里选购珠宝和丝织品”，而是这座城市中的激情。这座城市同她已离开了的俄国继续互通声气。她喜爱北京，是因为这是一座能够公开演讲、允许私人交谈的城市。几十个组织和院校邀请她去讲演，谈苏联见闻。中国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大学生住在北京，其中许多人热衷于西方思想，尤其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这年五月，手无寸铁的上海学生的抗议活动遭到了暴力镇压。北京学生在听取安娜·路易斯的演讲时，急切地提出了许多问题。北京大学研究生兼教师陈翰笙就是提问的学生之一。他是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土地改革问题专家，不久后要去美国工作。陈始终难忘他初次见到安娜·路易斯时的情景。她那沉着的无懈可击的答问，她那充满激情的语调，吸引着绝大多数听众。她的声音，响彻了基督教青年会的讲演厅。据陈回忆，安娜·路易斯以其对苏联的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很有说服力地展现出革命的新成就。